

日本国语政策中的“废除和限制汉字”现象

徐 青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日本“国语政策”中的“废除和限制汉字”现象由来已久,其目的之一即是要削弱近千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构筑与西洋列强的平等关系,成为现代化国家。在西洋文明的“一国、一民族、一语言”的重压之下,日本实施了国语的改革和统一。文章围绕着“国语政策”中的“废除和限制汉字”现象,对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张进行了梳理,回溯了“废除和限制汉字”运动的变迁,揭示了日本在“废除和限制汉字”运动中所体现的矛盾性。

关键词: 日本; 国语政策; 汉字; 废除; 限制论

中图分类号: I313.075

文献标志码: A

当今社会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对“英语的普及”、“少数语言的保护”等话题都已经不再新鲜。一国的语言在世界上拥有高度影响力的国家,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就大,相反其影响力就弱。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领域力量悬殊不均的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接触的时候,影响力弱的国家会自发地积极地同化影响力强的国家的语言,使自己的国力得以提升;而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的语言则经常蚕食其他国家的语言,促使影响力弱的国家使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以此增强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和支配。

170年前,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东亚地区原本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体制”崩溃。日本面临着一边是“衰败的大清国”,另一边是“培理来航”,在西方列强的重压之下,处于“焦虑”状态中的日本开始了国语的改革,即所谓的“国语政策”的施行。

一、有关“国语政策”的先行研究

至今为止,日本国内有关“国语政策”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包罗万象。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类别:1)“国语政策”中“言文一致”的研究;2)“国语政策”中汉字废除和限制汉字的研究;3)“国语政策”中代表性人物及其主张和相关组织的研究;4)日本在殖民地朝鲜、台湾以及“满洲国”等“大东亚共

荣圈”等地区实施的“国语政策”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的时间设定来看,有跨越几个世纪从德川幕府时期直至明治维新前后的纵向研究,也有从日本本土延伸至日本外地的横向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田中克彦的《从语言看民族和国家》^[1]、酒井直树的《过去的声音——有关18世纪日本言论的语言地位》^[2]、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3]、子安宣邦的《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4],此外还有韩国研究者李妍淑的《“国语”的思想——近代日本的语言认识》^[5]。

与日本研究者相比,近年来中国的研究者对日本“国语政策”的研究主要以“言文一致”运动为主。比如,魏育邻的《“言文一致”:日本近代文学的形式起源——从历史到历史化》^[6]和《日本语言民族主义剖析——从所谓“纯粹日语”到“言文一致”》^[7],以及北京大学齐一民的博士论文《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8]等都是此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齐一民的博士论文全面地深入日文文献,对“言文一致”相关的历史典籍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并对“世界语言潮流”进行了梳理,其中欧洲的从书面语言向口语化语音方向的“整体转型”无疑是中日文学改革的一个“分流”的观点,具有其他论文不可比拟的新颖性和创新性。魏育邻和齐一民在各自的论文中虽然

也提到了日本“汉字”问题,但两位研究者的研究重心仍是“言文一致”运动。

在专题研究“汉字废除和限制”的相关成果中,陈月娥的论文《从原敬的“减少汉字论”看近代日本东西方文明的撞击》^[9],以近代日本著名政治家原敬的“减少汉字论”为切入点,梳理和廓清了明治时期各种日语文字改革言论和明治政府的国语政策,探讨了当时日本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汉字的处境。作者的另一篇论文《日本“汉字论”中的他者——以明治时期的文字改革论为中心》^[10]则围绕“支那”和“西洋”问题,分别以汉字和罗马字为媒介物,指出在文字改革运动中,“支那”是“否定性的他者”,而“西洋”则成为“肯定性的他者”。陈月娥的论文《何谓“语言的近代性”——评述日本语言政策与语言思想之相关研究》^[11],则把重点放在了日本学术界,对至今为止的日本语言政策的主要研究进行了概要性评述,分析了促成这些研究的学术动态和背景,同时,对这些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梳理。

综观上述研究,不难发现日本的“国语政策”其立足点之一即是要削弱近千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尽快地摆脱大清王朝的阴影,构筑与西洋列强的平等关系,迅速地进行现代化的改革,成为能与西洋列强相抗衡的现代化国家。因此,日本在西洋文明的“一国、一民族、一语言”的重压之下,不得不进行语言的改革和统一。主要实施的政策有汉字废止限制、言文一致、统一表记和制定标准语。以往的研究中,中国学者一般都聚焦于日本国语政策中的日本“语言民族主义”、“东方主义”和“他者论”等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在国语政策中的反映。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其中所经历的复杂历史过程。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语政策”中的“废除和限制汉字”现象,通过对“国语政策”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主张的梳理,回溯了“废除和限制汉字”运动的变迁,探讨了这一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性。

二、本多利明的汉字观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日本的国语政策始于何时?日语中原本只有口语,一直到公元五六世纪才从我国传入了汉字。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的书面文字特别是汉文、汉文训读长期被精英和政治阶层所独占,掌握在一小部分特权阶级手中。丸山敏秋认为在汉字的“音读”^①外又加上了“训读”,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12]91}。汉字在具有众多优点的同时也存在字数多、笔画多、发音难等

特点。

日本的“国语政策”并非是黑船到来后才发生的现象。笔者曾经在论文《幕末维新时期日本的中国认识模式》中指出,在18世纪末,日本其实就已经通过兰学开始研究欧洲,特别是在医学、天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和航海术等领域。相应的兰学者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崇拜进行审视并展开批评。由此,日本不再把儒学看作唯一绝对的文化价值,开始认识到儒学只不过是世界上存在的多样文化之一,进而促发了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13]63}。

笔者认为排斥汉字和汉语的现象,在江户时代的国学者和研究西洋的学者中间就已经开始出现。江户后期因《经世秘策》和《西域物语》而闻名的数学家、经济思想家本多利明^②(1743—1820)曾指出,“日本应该比支那更有名誉,因为日本从神武以来皇孙没有失传过,也没有被他国侵犯过”^{[14]149}。他进而认为,“文字应该是以记录事情,述说感情为宗旨”,“支那文字有数十万之多,如果要全部记住的话,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就算有人能够把它们全部记住,对于国家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益处。文字应该是以记录事情,述说感情为宗旨,使用我们的假名更加方便。在国外,一个博学的人不仅要能够通晓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连他们的国情物产也能通晓,而我国优秀的儒学者却连一国之事都搞不明白。因此不应该把精力都用在文字上。”^{[14]29}笔者在论文《幕末维新时期日本的中国认识模式》中指出,本多认为日本的平假名文字以及欧洲的拉丁字母比汉字更为优越。在本多看来,与汉字相比,日本的平假名文字更便于记忆和书写,故提倡从汉字文化中自立的言论。类似的语言革新的倾向在18世纪的日本近世是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现象,它对日本作为近代国家特征的生成起到了重要作用。^{[13]63}本多仅仅是持有这种看法的日本汉学家中的一人而已。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当时只存在对汉字汉语重新评价的“异论”,但并无任何的“政策”可言。

三、“汉字废除”和“汉字限制”

对日本的“国语”——日语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整

① 音读是起源于中国的读法,可分为吴音、汉音和唐音三种。还有因误读等原因广为流传的俗音。

② 本多认为,日本应以征服世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为终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日本以勘察加半岛、满洲、库页岛等地为主要扩张地区,并且主张学习欧洲,实行“开拓制度”(即殖民制度)。

理和统一始于19世纪。统一前的日语,其方言和阶级语言的差异很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进行交流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国家的主导下,日本只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就强制性地完成了日语由“自然状态”到“标准国语”的转变。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语政策中最主要的争论就是“汉字废除”和“汉字限制”,大致的观点可分成三类:1)废除汉字,使用假名和罗马字,使用新体字;2)限制汉字的数量;3)尊重汉字,不做限制地使用。

(一)前岛密和汉字废除论

“废除汉字、使用假名论”最初的倡导者是前岛密,也是日本“国语政策”最初的倡导者。1866年,前岛密上书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提出了“汉字废除的建议”。此时正值封建制度即将濒临崩溃,幕府并没有对这份建议书多加重视。但是,之后出现的“国语·国字”改良论者的意见和主张几乎都包含在这份建议书中。这份建议书的宗旨就是要全面地普及国民教育精神。前岛主张,为了富国强兵,必须普及对国语的教育,废除学习困难的汉字,以假名文字为国语。与此同时,明治政府第1代文部大臣森有礼也提出了将罗马字定为国语的言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日本社会舆论的支持。

前岛密和森有礼有关“国语”改革的主张受到了极大的拥护。拥护者们在日本先后成立了把假名文字作为国字的“假名会”^①和建议使用罗马字的“罗马字会”。两个组织的内部虽然意见并不一致,但是该会会员却在不断地增加。1887年可谓是最昌盛的时期,仅东京本部的正式会员就达到5009人,加上联络委员的人数,该会总人数超过1万。但是,由于其内部意见不一致限制了该会的发展。主张使用历史假名的“假名之友”和主张使用发音式假名的“伊吕波会”、“伊吕波文化会”之间无法达成一致。由此,各部会的机关杂志也分道扬镳开始另行发行,“假名会”的运营陷入了危机。在部会内部意见不统一的情形下,“假名会”的活动也随之衰退,1887年末,部会的活动处于停滞阶段。到了1890年“假名会”的活动彻底停止。就这样,“废除汉字、使用假名”的运动走向了衰亡。

(二)南部义筹和罗马字使用论

最初的“罗马字使用论”始于南部义筹。南部阅读了大庭雪斋^②的《译和兰文语》后,从西方诸国的国语独立中得到启发,希望日本的国语也能够独立。为此,提出借用罗马字修改日本的国语,但是,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却没有在《修国语论》(1869

年)^[15]中提起,仅仅指出了“西方文明诸国都是这样做的。”1872年南部向文部省提交了“改换文字”的建议书。有趣的是南部自身就是一个汉学者,像这样精通汉文的学者却主张汉字的废除和限制,这在南部之后也大有人在。在此须指出,当时的日本文部省对“罗马字的使用”在政策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却苦于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罗马字使用论”也这样不了了之。

1877年“罗马字使用论”拥护者之间也开始结盟。1882年矢田部良吉的“用罗马字来拼写日语”的主张得到支持。1884年外山正一发表了“对主张使用罗马字人士的通知”,提出应该与“假名使用论”拥护者们相互提携。同一年,外山又发表了“罗马字会发足的趣旨”,这一趣旨促进了“罗马字使用论”拥护者之间的团结,聚集了近70余人。1885年“罗马字会”正式成立,外山和矢田部等人都是该会的创立委员。“罗马字会”成立后,共推选出40名调查委员,外山正一任委员长。

但是,“罗马字会”也发生了和“假名字会”相同的问题。有关使用罗马字来拼写日语,该采用何种方法,分歧无法获得统一,进而在部会内部产生了对立的两派。最后,外山等人在听取了黑本^③等外国人的意见后拟定了原案。三个月后,发表了“罗马字的日语拼写法”。矢田部向书写调查委员会解说了罗马字的使用方法^④,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黑本式”拼写法^⑤。但是,即使外山和矢田部再怎么努力,实际上不合理的地方还是很多。

时至今日,“罗马字会”内部出现的“黑本式”和“日本式”的两种拼写方式还是处于对立状态。内部对立最厉害的时期是1887年至1889年。此时该会会员人数已经达到7000人,可以说是该会最昌盛的时期。但是,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该会的活动开始衰退,走上了与“假名会”同样的命运。1892年提倡“使用罗马字”的运动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使用罗马字作为日本语言的标记符号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中田祝夫和林史典在《日本的汉字》^[16]

① 1880年(明治13年)—1882年(明治15年)在两年的时间内设立了小规模假名文字使用论者的诸团体(“假名之友”“伊吕波会”“伊吕波文化”等)。1883年(明治16年)合并为一个组织“假名之会”。

② 1805—1873 江户后期的兰学者、医师。

③ 美国长老派教会宣教士、医生,1859年来日,在传道的同时编著了和英·英和辞典,也是黑本罗马字的创始人。

④ 速学罗马字。

⑤ 又名“标准式”。

中指出:其一,罗马字不可能区别同音异义词(用假名书写也同样不可能);其二,用罗马字书写往往词不达意,要表达词的深刻意义,最终不得不使用汉字;其三,日语的音节最多的构成法是“一个子音加一个母音”,一旦罗马字化后,所构成的字便不可能通过人的视觉来记忆。

社会教育家丸山敏秋也在论文《日本的国语政策与汉字教育》^{[12]88}中谈到,用假名正确地书写汉字是件难于想像的事情。丸山举例了,“母亲与父亲和弟弟去八户”一文。如果把这句话使用假名来书写的话,就成了,“はははちちとをとととはちのへへいく”。丸山指出读起来不但花费时间还且容易读错。去掉汉字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理解,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变得更加难于读懂。同样的道理,如果采用罗马字来拼读那就难上加难了。

(三)福泽谕吉和汉字限制论

“假名使用”和“罗马字使用”的言论虽然盛行一时,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上获得有效地推行。很多日本人都承认学习汉字是一种负担。但是,汉字却承载了千百年以来的文化,如果把正在使用的汉字就这样给简单地废除,无论从感情的层面来讲,还是从汉字在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来说都是无法办到的。日本人虽然认识到了废除汉字采用假名和罗马字可以减少语言学习的负担,但是要全面地废除汉字,依靠假名和罗马字来替代汉字作为日常交流的文字来使用,这也很难得到支持和认可。

汉字全废即使在理论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根本没有考虑实际情况,可以说与现实社会是完全脱节的。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反省,提出只有把社会的现实问题考虑周全之后,再慢慢地改进,说不定还能行得通,这成为了“汉字限制论”拥护者们的观点。“汉字限制论”主张把日常使用汉字的数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限制汉字数量的增加。

最初提出“汉字限制论”的人物是福泽谕吉^①。在其1873年发表的《文字的数字》一文中可以得知,福泽“限制汉字的数量”的言论并非他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全面地废除汉字^[17]。“汉字限制论”只是他在政治上的一种手法而已。总的来说,从一开始把“限制汉字”作为目的本来人就很少。

(四)上田万年和新国字论

进入明治20年代后,有关“国语”改革的言论一时变得非常的低调。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在三国干涉下不得不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由此,也使日本

国民自觉地把目标放在了国家的独立和国语的发展上。这种自觉表现在国语和国字的改良问题上。甚至有人认为“日本人使用中国的汉字,多多少少总会受制于中国。因此,除去上述的使用假名和使用罗马字的言论之外,又出现了“新国字论”。在这一时期,很多有关“新国字”的言论以及相关的具体方案被提了出来。三宅雪嶺^②对新国字的提出感到失望,他这样说道:“虽说是新国字,但是毕竟是太难了。能够创造出世界一流的文字当然是好事,如果不是的话,到底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仅仅只以日本的文字作为新文字,感到自以为是,是很无聊的事情”。^[18]

“新国字论”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对于日本国民而言,自觉地尊重“国语”,并以此引发认真的思考却是一个难得的契机。1894年,日本国语学者上田万年^③从欧洲留学归来在演讲《国语与国家》中指出作为国语的日语与国家的关系,对国语没有被很好地重视感到惋惜,感慨如果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就必须好好地保护这个国家的国语。上田的发言后来成为促进日本国民的国语和国家自觉性的指导精神。1895年上田的专著《为了国语》^[19]出版,第二年,上田为了促成“国语调查会”的成立又进行了公开演讲。

与上田的意见相反的佛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的井上円了^[20]却提出了“汉字万岁,万万岁”、“汉字汉学万万岁”,“以语声保存於吾等精神之中,与其文字之形一起,印在头脑中留下印象”的言论,极力保护汉字和汉学。

甲午战争后,反对汉字的呼声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相结合而愈演愈烈。1900年,日本帝国教育会向国会提出了“有关国字国语国文改良的请愿书”,要求以日本政府为主导进行调查,实行国字国语的改良。1902年文部省设立了以上田万年为主事的国语调查委员会^④,这也是日本国语政策最初的委员会。即对之后的日本国语政策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也是国语审议会的先驱。

1908年,“临时假名使用法调查委员会”成立。委员之一的森鸥外极力反对文部省的方案。1922

① 矢野龙溪、原敬等也是“汉字限制论”的提倡者,当时“汉字限制论”得到了报刊的广泛支持。

② 三宅雪嶺(1860—1945),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对欧化主义进行批判,创办了杂志《日本人》。

③ 后来成为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

④ 后改称为“国语审议会”。

年,森鸥外逝世。上田接任会长后,该委员会发表了“常用汉字表”^①,对汉字进行了大幅度地限制。此时汉字的总数为1962字(常用汉字表),简体字是154字。当然这个汉字的使用限制,须借由报刊和出版社等报道机关的协助才能得以推行。可以说,当时日本的媒体是积极支持“限制汉字的使用”政策的。但是,由于第二年关东大地震的原因还是没能得以实现。

四、战后的日本国语政策

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GHQ(联合国军队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的监督下^{②[21]},日本的保守层在失去势力的同时也加速了国语的改革,由国语审议会主导的委员会^③频繁地举行会议。1946年通过内阁告示和训令公布了把“法令、公用文书、报刊、杂志以及一般社会”使用的汉字限制在1850字内,并规定无法用汉字表示的语言,须使用其它的语言或者使用假名来解决。

同一年,来日美国教育使节团打着“民主主义的市民精神和国际理解的成长”的口号在日语中开始启用罗马字。审议虽然通过,但是事实上却很难实现。最终日本政府参考了1924年的“假名拼写法改订案”^④,继而对假名进行改订,以现代语音为基础的假名的表音化终于被全面的认可。

当时,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人接受对假名的改革,同时也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1951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决定依据宪法对公文书和法令的措辞尽可能地做到平易化;经过多次改订后,1981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常用汉字表”,把汉字限定在1945字以内;1986年7月1日,日本内阁告示第1号又重新修定了1946年日本内阁告示第33号的“现代假名”。可以说,战后日本的宪法对“汉字平假名混合的口语体文章”的改革和推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五、小结:近年日本国内有关“汉字”的动向

综上所述,近代日本把“国语”作为关系国家存亡的大问题提出。“国语调查会”始于世纪之交的1900年,直至2000年“国语审议会”解散,期间虽然经历了100年,但是不管是“废除汉字论”还是“限制汉字论”,最终都很难付诸实现。

2010年6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第10版刊登了一篇对前日本语学会会长、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野村雅昭的访谈。标题是《莫要再增加汉字,日本語或将灭亡》。在访谈中野村极力反对正在酝酿并即将付

诸实施的“常用汉字表”的修改,他说:“我们应该限制汉字的数量,如果不那么做的话,日语就会灭亡!”

然而,2010年11月30日,日本内阁发布了新版汉字指南《常用汉字表》,增加汉字196字,删除5字,共计2136字。同时,在日本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报社也从2011年12月26日开始对中国人名的读音标记系统地采用中文的原音标记。朝日新闻社的这些举措显示了日本国内对汉字读音以及汉字使用能力的重视。从对野村的访谈到采用中文原音标记,我们不难看到,100多年前日本人对汉字的纠结矛盾在21世纪的今天又开始重演。

参考文献:

- [1] 田中克彦. 言語からみた民族と国家[M]. 東京: 岩波書店, 1991.
- [2] 酒井直樹. 過去の声 18世紀日本の言説における言語の地位[M]. 川田潤, 訳. 東京: 以文社, 2002.
- [3] 柄谷行人. 日本現代文学の起源[M]. 趙京華,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4] 子安宣邦. 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M]. 東京: 岩波書店, 2003.
- [5] 李妍淑. “国語”という思想: 近代日本の言語認識[M]. 東京: 岩波書店, 1996.
- [6] 魏育邻. “言文一致”: 日本近代文学的形式起源——从历史到历史化[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26(2): 112-115.
- [7] 魏育邻. 日本语言民族主义剖析: 从所谓“纯粹日语”到“言文一致”[J]. 日本学刊, 2008(1): 74-84.
- [8] 齐一民. 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3.
- [9] 陈月娥. 从原敬的“减少汉字论”看近代日本东西方文明

① “常用汉字表”: 在无法实现废除汉字的前提下, 开始重新评价汉字的优点。“常用汉字表”主要指日常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基础。此外,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 在GHQ的监督下废除汉字向表音文字转变的过程中, 把使用频度较高, 在短时间内还可以使用的汉字称之为“当用汉字”。1981年, “当用汉字”改为“常用汉字”, 也宣告了日本将继续使用汉字的决心。

② 《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称: 日本語大致都以汉字书写。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承认, 对学生来说, 记这些汉字是个过重的负担。在初级教育阶段, 学生们只是记和写这些文字, 就需要占用极大部分学习时间。在受教育的这个最初期间, 为记忆这些文字而白白浪费掉本来应该用以学习广泛有益的语文知识、数学技巧以及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知识的时间。

③ 国语审议会的委员是从报社干部、中小学校长中选拔, 此外, 还有不少是“罗马字”提倡者。

④ 1924年(大正13年)临时国语调查会总会表决了表音式的“假名拼写法改订案”。

- 的撞击[J]. 日本研究, 2008(3): 89-92.
- [10] 陈月娥. 日本“汉字论”中的他者: 以明治时期的文字改革论为中心[J]. 中日关系史研究, 2013(3): 79-89.
- [11] 陈月娥. 何谓“语言的近代性”: 评述日本语言政策与语言思想之相关研究[J]. 国外理论动态, 2011(7): 80-86.
- [12] 丸山敏秋. 日本的国语政策与汉字教育[J]. 何绍贤, 译. 汉字文化圈, 2007(5).
- [13] 徐青. 幕末维新时期日本的中国认识模式[J]. 外国问题研究, 2013(2).
- [14] 本多利明. 日本思想大系 44 本多利明·海保青陵[M]. 东京: 岩波书店, 1970.
- [15] 吉田澄夫, 井之口有一. 国語問題論集[M]. 东京: 富山房, 1950: 40-41.
- [16] 中田祝夫, 林史典. 日本の漢字[M]. 東京: 中央公論新社, 2000: 51.
- [17] 天沼寧, 浮田章一. 国語・国字問題小史[M]. 京都: 立明社, 1962: 46.
- [18] 平井昌夫. 国語国字問題の歴史[M]. 東京: 昭森社, 1948: 216-217.
- [19] 上田萬年. 国語のため[M]. 東京: 富山房書店, 1895.
- [20] 井上円了. 漢字不可廢論[M]. 東京: 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1900.
- [21] 村井実訳. アメリカ教育使節団報告[M]. 東京: 講談社学術文庫, 1979.

“Abolishing and Limiting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Japanes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XU 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bolishing and limiting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erm in Japanes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One of the purposes is to weaken effects of China on Japan in the past millennium, construct equality relation with western big powers and become a modern country. Under the heavy press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of “one country, one nation and one language”, Japan implements reform and unific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abolishing and limiting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Japanes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to sort each school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recalls changes of “abolishing and limiting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reveals contradictions of Japan in the campaign of “abolishing and limiting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Japan;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Chinese character; abolish; limitation theory

(责任编辑: 任中峰)